

TOMORROW'S CHINA

# 明日中國

〔美〕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著

華蘇揚 譯

Anna Louise Strong

## 目錄

|                        |     |
|------------------------|-----|
| 譯者序 .....              | 1   |
| 第一章 中國——盟友還是目標？ .....  | 001 |
| 第二章 窯洞之城 .....         | 009 |
| 第三章 中國共產黨人 .....       | 019 |
| 第四章 毛澤東 .....          | 033 |
| 第五章 延安打到了海邊 .....      | 045 |
| 第六章 「馬歇爾計劃」的首個考驗 ..... | 057 |
| 第七章 張家口——「新資本主義」 ..... | 069 |
| 第八章 政府如何轉入地下 .....     | 081 |
| 第九章 東北地區 .....         | 095 |
| 第十章 通往齊齊哈爾的鐵路 .....    | 107 |
| 第十一章 耕者有其田 .....       | 121 |
| 第十二章 對付精銳兵器的策略 .....   | 129 |
| 第十三章 他們的戰線向前推進 .....   | 141 |

## 譯者序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是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著名美國記者和進步作家。她一生完成了大量新聞報道，撰寫了包括《人類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國》《百萬農奴站起來》以及《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等在內的三十多部作品。毛澤東主席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就是在接受她的採訪時提出的。

斯特朗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弗蘭德城，青少年時期隨父母輾轉美國國內和歐洲多地生活學習，受過良好的教育。190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斯特朗先後投身兒童福利、婦女權益和新聞報道方面的工作。擔任記者期間，富有正義感的斯特朗就對工人階級懷有強烈的同情心，積極探尋工人階級的出路和社會主義的最佳實踐方式。上世紀三十年代，她有機會前往蘇聯，實地採訪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在莫斯科創辦英文報刊，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斯特朗五次訪問中國，了解中國的工農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解放區軍民的鬥爭與生活情況，通過文字讓世界了解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真實情況。

《明日中國》(1948)一書是這期間斯特朗在中國主要解放區採訪

活動的實錄。全書共十三章，短小精悍，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主要時代背景，寫作素材主要來自斯特朗的實地考察與人物訪談。儘管在訪問過程中經歷了種種艱險，斯特朗秉持記者應有的客觀冷靜，隻字未提途中的各種困難，將筆墨集中在切實呈現所見所聞之上，文字樸素流暢，通俗易懂。

1946年至1947年間，斯特朗懷着求真的態度，深入解放區的城鎮和鄉村，通過面對面的交談，實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與思想，了解軍政領導人和尋常百姓的工作與生活。在該書的第一章，斯特朗直接提出了此輪採訪的核心問題，即：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中國應該被視為盟友還是敵對的目標，這個問題也是當時國際社會非常關心的問題。在接下來的十二章中，斯特朗通過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了解中國共產黨希望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政治抱負和基本方針。她通過與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交談、走訪工廠和農村，近距離了解共產黨人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與策略，準確抓住了共產黨人提出解決土地問題是關鍵等重要決定時展現的敏銳與務實。斯特朗在採訪和觀察的基礎上，細描了共產黨人採用靈活獨特的戰略戰術創造的一個又一個戰場奇跡，展現出他們在軍事方面的果敢與睿智。她還通過聆聽當事人講述和實際參與等方式，將共產黨人以大局為重、有禮有節的外交方略呈現在讀者面前。斯特朗在敘寫上述四個方面情況的同時，穿插記錄了國民黨政府在諸多重大決議上的出爾反爾、內部腐敗、一味依靠外部勢力以及接管原日佔地區時的無能等史實。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斯特朗用充分的事實和鮮明的對比讓讀者看到，共產黨人不論處境如何艱難，始終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人民為根本制定政策方針，不謀私利。該書近尾聲處，筆鋒又轉回斯特朗對毛澤東的那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採訪，有力地回答了全書開篇時提出的問題，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一片充滿希望的土地，絕不應該成為任何國家的敵對目標。作家在書中還引用解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論持久

戰》和《論聯合政府》等我國讀者耳熟能詳的偉人名篇中的重要論斷，讀來讓人覺得倍感親切，也讓人明了斯特朗關於明日中國是希望之地的結論一方面基於採訪與實地考察，同時也基於扎實的理論研讀。

對明日中國所懷的巨大信心推動七十二歲高齡的斯特朗衝破重重阻力，於 1958 年第六次來華並定居北京，選擇已然從「明日」化為「今天」的中國作為自己的歸宿之地。此後，她筆耕不輟，繼續向世界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和取得的成就，用自己飽蘸激情的筆為增進中美人民之間的了解與友誼做貢獻，着實令人敬佩。

此次的漢譯本是依據上海時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研發，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 年出版的「紅色經典」系列《明日中國》英文註釋版譯出，也是該書的首個漢譯本。譯者希望身處當下盛世的廣大讀者，細細品讀斯特朗筆下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一個個瞬間，重溫這段已經耳熟能詳的紅色歷史，賡續紅色血脈，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為中華民族譜寫更加燦爛的明日華章。

# 第一章

中國

——盟友還是目標？

以美國飛機和子彈為手段的宣傳正在毀掉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對美國懷有的善意。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牙醫馬格達倫·羅比策博士，為人穩重，態度和藹。當她走進陝北一家託兒所，要在孩子們準備撤進深山前為他們做牙科檢查時，她的白皮膚引發了一陣恐慌。「美國人！美國人！」孩子們尖叫着，有的緊緊抱住老師，有的則跑到冬季寒冷的室外。最終，經過一番安撫，他們被告知醫生不是美國人，而是捷克人。他們從未聽說過捷克人，但這個中性詞讓他們感到心寬。至少，可怕的「美國人」還沒來！

是甚麼讓「美國」成了一個讓孩子們害怕的名詞？那些六歲的孩子身處遙遠的西北部蒙古沙漠邊緣，對美國又了解多少呢？

他們知道的是，為了躲避「美國飛機」，需跑進防空洞求得安全；他們知道的是，昨晚，在那個對他們來說意味着安全和家的狹窄窯洞裏，他們的父親向母親道別，並最後一次長久地擁抱了他們；他們知道的是，要動身了，婦女和兒童先走，走進山裏充滿了未知數的冬季；他們知道的是，之所以要在夜裏走，是因為那些「美國飛機」白天飛得很低。

在他們年幼的頭腦中，所有最後的道別，所有的恐懼和失落，都與「美國的」這個詞聯繫在一起。就讓那些外交官和軍火商仗着辯才過硬在紙面上去說吧，那些飛機現在是中國的，是被派來「幫助中國」的。中國的孩子和農民<sup>①</sup>都知道中國從來沒有製造過飛機，所以當它們從空中飛來大開殺戒的時候，他們仍會管它們叫「美國飛機」。中國從來沒有製造過，也從來沒有花錢買過這些飛機，中國人

---

① 中國的土地耕作者現在主要是「佃農」(peasants)，即封建制度下的耕者(feudal tillers)，但土地改革後，他們開始成為「農民」(farmers)，即理解市場為何物的自由企業化生產者。在本書中，我依情況從兩者中選合適的使用。——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民民主選舉出的代表從來沒有要過這些飛機。它們來自美國，而且它們奪人性命！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人員能給你舉出很多例子。他們的駐地、他們的船隻，還有他們的卡車在山東不斷遭遇轟炸。首先要說的是孫中山夫人的中國福利基金會贈給蘇北人民的平民醫院。因日軍侵略，蘇北人民遭受的苦難比大部分人都要深重，還經受了各種熱帶疾病的肆虐，因此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欣然同意將醫院定點在那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還正式向蔣介石軍事當局通報了醫院的運輸路線和位置，以期它能被視為平民救濟資源得到底護。而後，飛機就來了，第一天低空掠過，似乎是為了確定醫院的位置。接下來的兩天裏，它們又飛回來，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醫生的話來說，進行「認真仔細、有條不紊的掃射」。飛機從上空中掠過，醫院不得不轉移躲藏起來，就像當地選舉產生的人民政府要隱蔽起來，田野裏的農民要隱蔽起來一樣。

一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人員從山東回來後斷言，那裏會發生饑荒，因為農民都不耕作了，他們害怕那一次次「連單架牛車都不放過的突襲」。他的說法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站所在的一小片區域為依據，是言過其實了。確實，山東有數千公頃最肥沃的土地無人耕種，因為那是平地，缺少掩蔽，且靠近青島的美國海軍和空軍基地，飛機就是從這個基地起飛對農村實施轟炸的。而處在丘陵地帶的農民有信號系統向他們發出警報，防空洞也大得足以把一整架牛車趕進去。

那些農民用其不可戰勝的中式幽默開玩笑說，在青島訓練的美國人有一點很好。那些美國人「吃飯時間太規律」，以至於農民能放心地在「早上九點前，傍晚五點後，中午十二點到兩點間犁地！」這個玩笑表明人們早先對美國人的好感已大打折扣。

一年多前，同樣在山東，數千名農民集體出動，搶救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聖誕郵包。一位在青島任情報局局長的美軍上校給我講了這樣

一件事。一架從青島飛往天津的美軍運輸機因發動機故障，將二十二個郵包拋下飛機，散落在山東境內二十二英里範圍的區域。為了此事，這位上校飛抵「共產黨人的首府臨沂」。「共產黨政府」發動農民，於是農民冒着寒冷去搜尋郵包。上校頗為得意地說，他們找到的「不是二十二個麻袋，而是二十四個」，因為有些麻袋摔破了，裹住了其他袋子。

「我認為一封信或一個包裹都沒丟，」他補充道，「這個例子體現了世上任何地方都無法超越的誠實！他們從沼澤地裏把那些郵包挖出來，你能從袋子上的泥巴判斷出來。他們還在懸崖上和樹上找到了它們。」農民們不肯收錢，因為「我們是盟友」！

據這位上校講，那些農民變得不再友善。最後一次去臨沂——在臨沂被蔣軍佔領前——他發現氣氛很凝重。「前一天，他們剛遭到掃射，是我們給蔣介石的那些飛機幹的，」他說，「他們讓我四處轉轉，看看後果。他們死了四個人，還有幾個躺在醫院裏奄奄一息，許多建築物被炸毀。他們還給我看了用過的彈藥。那是美國造的東西。他們說：『美國不該用這種方式幫助中國。』他們明顯很冷淡，沒有請我再去。」

這點尤為嚴重，因為美國的子彈和炸彈落下的地方正是「明天的中國」。地處北方的這部分中國掌握着明天。我們稱其為「共產黨的中國」，而那裏的人民則稱其「解放區」，並稱他們的政府是民主的。這已然是一片不容忽視的土地。其面積——即使是在 1946 年 1 月喬治·C. 馬歇爾簽署「停火」令之時——就與密西西比河以東的美國相當，人口比全美總人口還多。內戰爆發後的兩年裏，美國投入近六十億美元要摧毀這個中國，而「解放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解放區」的人口也從之前的一億四千萬增加到 1948 年 6 月的一億六千八百萬。

他們已經行動起來着手建立一個能為全中國人民代言的聯合政府，一個將向南京政府發起挑戰的政府。南京政府因通貨膨脹和腐敗

逐步走向衰落，因此那些年輕人，那些有活力、思想進步的明日中國締造者們，穿越條條戰線，深入內地。解放區的各省府業已表現出自身的穩定、廉潔、在沒有外國資助的情況下可以自給自足的能力。在它們周圍，已經聚集了秘密從蔣統區前來的代表，他們要組建一個——全國性的——明日政府。

今天，正是這個中國被美國軍事統帥們定為目標而非盟友！

美國必須朝中國放槍消滅共產黨人嗎？美國必須發動全面戰爭剿滅北部的這個中國嗎？即便如此，他們也未必敵得過它。這些生活在鄉野的中國人擁有機動的部隊和隱蔽起來的政府，他們連原子彈都不怕！

或者，是否是時候了解一下他們在做甚麼呢？他們的計劃是甚麼？他們取得了哪些成就？沒有人完全說得清楚。十年來，這些被外界稱為共產黨的地盤，而自稱是民主區的北方地區一直被呼嘯的鋼鐵槍彈構成的帷幕掩蔽着：日本人發動的戰爭加上蔣介石的封鎖。有時，封鎖有些鬆動，大膽的記者會深入其中的部分地方。但即便是埃德加·斯諾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其中也僅能描寫陝西北部的延安地區，其他更廣大的區域尚未有人涉足。自埃德加·斯諾時代以來，解放區不斷發展壯大，它們的面積是當年的二十倍，現有人口是當年的一百倍。假如僅依據土地貧瘠的延安地區的情況來描述解放區，就好比僅憑阿爾巴尼亞的情況來描述戰後的東歐一樣。

這些是我 1946 年去中國時的想法。這一年後來被稱為「馬歇爾休戰年」。當時在北平突然冒出這麼個叫人興奮的機會，讓我得以詳細了解這個北部的中國。為執行「停火」令，在美方主持下，成立了一個名為「軍調部」的超國家機構。該機構的總部負責調派美國軍機飛往華北和東北的近四十個地點，這些地方設有美國人領導的「停戰小組」。這讓美國空軍有權在直至蘇聯邊境的中國全域活動。它還能送記者去華北地區，如果他們有時間、也有意願的話。

這個機會絕佳——而且是臨時才有的。由於內戰不斷擴大，沒人

知道這個執行部會存在多久。我抓住這個機會：飛去了延安、張家口、山東、河北、東北。我在解放區逗留了九個月，比之前任何外國人都更為全面地走訪了各個解放區。1947年初，執行部關閉，我跟着最後一批飛機中的一架離開此地。

外人想要到訪並親眼看看這個內戰壁壘後、地處內陸的中國，現在可能很困難。但它的發展脈絡已然清晰可見。1948年末，在美國，通過關於這個北方中國發展的零散評論我了解到，它已經發展擴大至長江，甚至跨越了長江，並正在擬建聯合政府。此時我明白，一年多前在延安他們向我預言的事正慢慢變為現實。這不是西方的翻版，也不是蘇聯的翻版，而是從中國的土地上生出的新型民主，它會將一個古老的民族變為一個現代國家。

我知道，整個亞洲都在關注這個新中國。因為這些解放區似乎向人們證明了它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無法打敗它們，解放區通過抗擊日本成長起來。蔣介石打不垮它們，他花了二十年力氣，沒能成功。美國試圖通過帕特里克·J. 赫爾利大使和阿爾伯特·C. 魏德邁將軍的「大戰政策」以及喬治·C. 馬歇爾將軍的「休戰政策」來消滅解放區。二者均以失敗告終。

「解放區」不斷擴大。佔人類一半的南亞和東亞各族人民一直在關注，因為整個亞洲都處在民主革命的陣痛中，而新亞洲的頭生子似乎已經降生！

美國的選擇——視那樣的中國為盟友還是目標——將不只決定中國的未來，也可能決定美國的未來。

## 第二章

### 窯洞之城

我們的飛機從北平向西飛行。十二年來，延安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重鎮，它地處中國西北部蒙古沙漠邊緣的貧瘠丘陵地帶。歷時三小時的行程中，我們途經的山峰越來越陡峭，峽谷也越來越狹窄，最後出現的是形似月球荒山的光禿禿的山坡。人們都住在懸崖峭壁上的窯洞中，所以從空中幾乎看不到居民點。

我們的飛機急轉向下，在石山之間急速險行，甚至擦到了峭兵站崗位置的荒草。我們走出地面高低不平、被用作機場的荒地，兩輛卡車和幾輛吉普車出現了。一輛卡車是中國共產黨軍事總指揮部的，另一輛是美軍聯絡小組的，自約瑟夫·P. 史迪威上校成立該小組以來，它就一直在這裏，負責營救在中國上空被日軍擊落的美國飛行員。我被安排住在美軍大院裏，那裏現在成了接待外國訪客的招待所。

我們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顛簸前行，車的下方是一條淺淺的河，河對岸有一座城市的廢墟。延安曾是座帶城牆的城市，但遭日軍轟炸後，城裏的建築已蕩然無存。於是，人們離開滿是瓦礫堆的城市，在峭壁上的黃土中挖洞而居，就和中國該地區的農民世代居住的地方一樣。現在所有延安人都與自然景觀融為了一體，散居在超過十平方英里的石頭山上。炊煙從嵌在山間的爐灶煙囪中裊裊升起。高高低低的窯洞向外敞着口。從所有的山谷抬頭望，都能看見穿着藍色褲子的人跳過溪谷，沿着開鑿出來的陡直小道回家去。

卡車在延河河床上行駛，一路顛簸把我們送到了美軍大院。這個地方由幾棟被土牆圍起來的建築構成。其中最大的惠特爾西廳是為紀念聯合抗戰中在華北陣亡的美國空軍中尉惠特爾西修建的，裏面設有供社交和用餐的大廳。軍官居住區是一長排僅部分嵌在崖壁裏的半窯洞式居所。現在，這些地方也可以供偶爾來訪的記者住。大院裏還有一個氣象站、一部與執行部聯絡用的無線電和一台供照明用電的發電機。

大院最初是為一個由十到二十人組成的美軍聯絡小組建造的。對日作戰期間，該聯絡小組為美國陸軍收集軍事情報，情報由共產黨領

導的華北各地軍隊提供，還曾負責營救被日本人擊落的一百多名飛行員，這些飛行員是中國農民冒着極大風險救下的。這地方現在幾乎空置，只有一名美國少校獨自以「觀察員」身份在值班。他仍會向執行部提供情報，但抱怨稱這個地方沒人管了。

「上次去北平，我發現他們居然在官方地圖上標了一支由二十架飛機組成的『延安空軍』！他們為甚麼聽信南京政府給的這種搞宣傳用的小道消息，而不找這邊自己的觀察員問問呢？我每天都和他們保持無線電聯繫。我本可以告訴他們，延安沒有空軍，從來就沒有過……有的只是一架被蔣介石棄下的作為抗議的飛機。因為沒汽油，它就像一件展品停在那裏。但執行部似乎並不想知道真相。」

這位軍官很快就被調走了。派駐延安的美國觀察員更換頻繁，或許是因為他們很快就喜歡上了中國共產黨人，抑或是因為他們中無人能在延安發現所謂「與蘇聯的往來」，而他們都被告知要找到這種聯繫。在延安的蘇聯人只有兩名，都是醫生——一位外科大夫和一名醫護人員。蘇聯人還在東北的時候，經蔣介石正式批准，他們帶着裝滿兩架飛機的紅十字會物資飛到延安。兩人忙於醫療工作，不談論政治，也無法與莫斯科取得聯繫，甚至連家都回不了。在延安還有其他外國人——由澳大利亞人和美國人組成的友誼救護隊，以及一名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來的捷克醫生。他們靠美國的飛機去延安之外的地方。

延安並沒有紅旗飄揚。這裏懸掛的旗子與蔣介石在南京掛的一樣，都是代表中國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到延安後的第一週我就注意到了這面旗。當時，蔣介石的八架飛機剛對延安進行了轟炸和掃射，我從防空洞出來下山時看到了它。那面旗就在那裏，這面派出了轟炸機的旗，同時也飄揚在這些乾旱地區上方晴朗耀眼的天空中。它無聲地象徵着延安人在內戰中和內戰後為之奮鬥的中國統一。

延安的窯洞集群分佈在大約二十多個不同谷地的崖壁上。窯洞的類型和大小各異，有的小而簡陋，有的則很大，有的帶石質飾面並鋪

了石質地面。當然，窯洞的一大優勢在於價格低廉，不僅是花錢少，而且木料和金屬用得也少。中國西北地區木材稀缺，被風化侵蝕的山坡上早已沒有森林，變得光禿禿的，金屬材料則更少。因此，這裏的人們世代都在懸崖峭壁上的硬土裏開鑿洞穴，洞穴的外牆是格柵結構，門窗就安裝在這上面。延安的一個窯洞除人工費外，材料費不到十美金。我見過一個農民的家，是一個兩開間的窯洞，買下這個窯洞花了他五蒲式耳（乾量：美1蒲式耳=35.239升）穀子。

這裏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污水處理系統。用的水是井水，所以最好燒開。照明靠的是蠟燭或者不比蠟燭亮多少的小煤油燈。美軍大院裏有一台發電機，可以供電供到晚上十點三十分，但僅限於離它最近的房子。中國農民覺得蠟燭太貴，他們把自家榨的菜油裝在小罐子裏，再懸上一根棉質燈芯，這種燈的亮度只夠讓人不至於在房間裏絆倒。延安的公共大廳照明用的是吊在天花板上大油燈；這些油燈很亮，但忽明忽暗，有時還會炸裂，逗得人們開懷大笑。

延安的生活節奏不緊不慢。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如此。在這裏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地，感受到季節緩慢的節奏，感受到腳下是中國廣袤且難以征服的土地，感受到頭頂不停升落的太陽，帶來播種期和收穫季。即使在冬天打仗的時候，人們也會關注新的降雪會「對作物有利」。

因此，儘管在打仗，延安在我心目中依舊是一處和平的避風港。因為在那裏度過了六個月，我的健康狀況更好了，我覺得我能活得更長久些。我注意到，從南京、北平、上海來到延安的中國人也都有這種安寧之感。

當我向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談起延安的這種閒適感時，他半開玩笑地讓我把「人民解放軍」總指揮朱德將軍與蔣介石總司令做個對比。「他們兩人都剛過完六十歲生日。蔣介石已經是滿頭白髮，而朱德只有幾根白頭髮！」

我把他的話太當真了。「但是朱德在戰場生活很艱苦，」我補充

道，「而蔣介石就在南京輕鬆地坐着。」

「我覺得他坐得並不那麼輕鬆。」毛澤東目光熠熠，表示反對。

人們從各個解放區來延安諮詢或者彙報工作。我在那裏遇到的人有來自山東的、蘇北的、東北的，也有來自靠得更近些的山西、河北和察哈爾的。對他們來說，走這一趟可不像從上海到南京或從紐約到華盛頓那樣，只是半天的路程。他們要花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就像美國人騎馬從緬因州去華盛頓一樣。因此，一旦他們來這裏，那就不是進行簡短的會面，而是要展開長達數日的討論。

共產黨人為這個住在窯洞裏的地方帶來了一些現代設施：六輛吉普車和卡車，它們用的是當地油井和手工煉油廠生產的低標號汽油；一部可以跨越延河與重要地點聯絡的野戰電話；一份報紙和一部無線電，讓這裏能與外部世界的生活建立聯繫。

清涼山上的生活是原始與現代的奇特結合。在崖腳下一個較深的窯洞裏，一家印刷廠用當地的野草手工生產略帶棕色的厚紙印製《解放日報》。五百英尺高處，在陡峭且潮濕天氣裏會變得很濕滑的小路旁，報社和電台的工作人員住在相連的岩脊上。他們的天線在高遠天空的映襯下搖擺着。這些洞穴很小，僅六乘十二英尺見方，靠炭火盆勉強取暖，照明則全憑小燈。

這些昏暗的窯洞中，來自不同地方、懂多種語言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負責監聽全球新聞。有一位戴着耳機的年輕人，藉着微弱的燈光記錄美聯社的新聞。他旁邊，另一個正在記錄聯合通訊社的報道。對南京中央新聞社——蔣介石的官方通訊社——則有人負責一天二十四小時監聽。由於《解放日報》的篇幅有限，這些新聞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刊出，不過它們會以文摘的形式提供給中央委員會和任何想要了解新聞的人。我在延安得到的世界新聞比在北平的更全面。此外，延安還與解放區的各區政府以及華北和東北的各軍戰地指揮部保持着無線電聯繫。大家都很重視給電台供電的發電機，它不會用來給電台工作人員的窯洞、甚至不用來給毛澤東主席的窯洞提供照明。

清涼山上有着志同道合的人，這對知識分子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山上每個人都是人物，有着精彩的人生故事。廖編輯曾任八路軍駐南部某城市的外交代表，享有個人豁免權，直到有一天，一名蔣介石的政治警官對他說：「總司令有請」，隨後便把他投入監獄關了若干年。余編輯是一名工程師，有鐵路運輸專業的學位，最終他被派往東北協助鐵路運營工作。有六個中國年輕人負責運作英文廣播，從香港、新加坡、爪哇甚至美國回來，為自己的國家抗擊日軍而鬥爭。其中陳龍是從爪哇回來的，舉止彬彬有禮，他們喊他「龍」，因為這是他名字的英文。

又高又陡的山勢讓清涼山成了延安核心區的一塊野地。月圓之夜，俯瞰三道山谷，景色美得攝人心魄。而在天色昏暗的夜晚，上山幾乎不可能，而且很危險。一個冬天的晚上，月光很暗，廖編輯的寵物狗跑出窯洞，在窯洞和戶外廁所之間被一頭狼拖走了，狗尖聲狂吠着消失在黑暗中，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哨兵根本來不及行動。一年後，讀到蔣介石的哨兵在黑夜裏消失在處於延安中心位置的清涼山野坡上時，我想起了這件事！

延安的社交生活友好且隨意，都是些大家熟悉的娛樂活動——晚餐、跳舞、打牌、看戲——但它們具有自己的特色。晚餐通常是五六十人圍坐在某個食堂的幾張圓桌邊一起吃飯。笑話多，笑聲朗。席間會上有一種酒精濃度很高、叫「白乾」的烈性酒，不過供應量很小。打牌的話，有些人打橋牌，但更多人熱衷於一種叫「百分」的玩法。這種玩法裏有兩個百搭，比橋牌更帶勁。朱德將軍是它的擁躉，對贏牌有着孩子般的熱情。在延安我感到難過的時候並不多，其中一次便是他接受我做搭檔，但我缺乏經驗害他輸掉了牌局。

演戲有很專業的演員，戲服和北平的一樣華麗。我們觀看了傳統的中國戲曲表演、稱為「秧歌」的短劇以及正規的三幕現代劇。美軍也為延安的文娛活動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作為對中方邀請他參加晚宴和舞會的回饋，美方觀察員放映了為士兵們準備的好萊塢電影。當時

流行的是以內心受折磨的女性為主人公、表現精神病態的片子。延安的知名人士禮貌地盯着影片中美國人怪異可怕的易激動的神情。直到換成放映二戰紀錄片時，他們才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沒人會盛裝出席這些場合，也沒人會特地去換套衣服。所有場合大家都穿政府發的那套結實的藍色棉布衣服。延安沒有好染料，所以這套衣服會因穿着時間的長短和日曬雨淋的時間不同褪成深淺不一的灰藍色。冬天則換成類似材質的棉襖套裝。婦女按中國農村的習慣穿褲裝。鞋子是厚棉布的，到冬天換成棉鞋，鞋底則是自產的大麻纖維做的。

一週最主要的社交活動是週六晚上的舞會，許多黨的領導人都會參加。中國樂器與西洋樂器並用，讓《我的肯塔基故鄉》等深受喜愛的老歌帶上了舞蹈的韻律。人們跳華爾茲、兩步舞、一步舞和一種由「秧歌」音樂伴奏、類似狐步舞但搖擺動作更多的四步舞。大家很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跳，想跺腳的就跺腳，想滑步的就滑步。一些劇院專業秧歌舞者的加入將雜技演員般的靈動感帶進了舞池。在黨政領導中間，充當勤務兵的「小鬼」們——外人管他們叫勤務兵——也歡快地轉着圈。環境雖然簡陋，但舞者們鬆弛的夥伴關係將諸多粗陋不足變成了樂趣。

舞廳的窗戶即使在冬天也是開着的，因為人們穿着棉衣跳舞。有一次，他們在地板上灑水抑塵，靠近窗戶的地上水滴結成了冰，跳舞的人滑倒了，引得眾人哄笑起來。我還記得有一次分發花生時他們提醒說：「把花生殼扔在椅子後面，不要扔到舞池裏！」舞會通常以自由的「秧歌」舞結束，這是一種轉圈的民間舞蹈，越轉速度越快，直至高潮處終止。

在那時延安的舞會上，我見到了三位主要的共產黨人。從南京歸來的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他跳起舞來盡顯外交官的優雅風度。他跳的華爾茲完美無缺，有時甚至是過於克制的完美。和他跳完後，你可能想要換換花樣，和「秧歌」演員或者那位俄羅斯大夫奧爾洛夫跳一

曲，大夫喜歡用力踏步，完全是哥薩克風格。不過周恩來始終是最佳舞者，他的控制力，他的靈活優雅——可以想見這些品質也運用到了他在南京的談判中。

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重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跳起舞來具有科學的精確性，即二加二必定等於四。不過大概每三支舞中會有那麼一次，他開始跳時似乎過於講究數學般的精確，隨後會加入一些讓人興奮的自由發揮，好比進入了數學的更高境界。這就像他的文章一樣，簡潔、精確的文字中，偶爾會穿插一些犀利的隱喻。

軍隊總司令朱德跳起舞來就像在進行他著名的「長征」。無論樂隊演奏甚麼，他都始終採用一步舞的步伐。如果你的舞伴是朱德，而樂曲是誘人的華爾茲，你可能會很羨慕地瞥一眼完美的舞者周恩來，他正和同樣完美的毛夫人一起踩着華爾茲舞步。但到了晚上舞會結束，你累得走不動，甚至站不動的時候，你仍然能和朱德跳舞。他的節奏很輕鬆，且持續而穩定，比坐着不動還容易。

在延安與人交談時，有一個詞比任何其他詞都更常聽到，那就是「人民，人民」。談話最終總是指向中國人民，還有世界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我們的政策必須是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這些是人們常聽到的口號。它們似乎不僅僅是口號，它們似乎是從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和對他們終將勝利的信念中自然流露出來的。

比如，朱德將軍是一位馳騁疆場三十五年的軍人。但是，當他穿着褪了色的藍棉布軍裝，坐在我的窯洞前談論內戰時，他的預測不是以武器裝備為基礎，而是以「人民」為基礎。

「蔣介石不可能贏，因為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他們會不斷起來反抗，直至取得民主。你不可能鎮壓所有人……我們中國人民就像是大海。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黨——就像一艘船，船開來把水攪得不太平。等船開過，水又聚攏如初。我們共產黨人則像海裏的魚，我們生活在海裏……」

晚些時候，當月亮平靜地從延安的山巒上方跨過之際，他在棗園